



安·巴·契诃夫 和他的时代

〔苏〕安·屠尔科夫著

朱逸森译

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

〔苏〕安·屠尔科夫 著

朱 逸 森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新

责任校对：万亚云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钱 锋

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

朱逸森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4插图 373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300册

统一书号：10190·175 定价：2.70元

目

录

“秘密成长的心灵”	1
向往广阔的天地	85
“探索,探索,探索.....”	132
俄国生活的转折点	194
走荆棘丛生之路	262
在两个世纪的交合点上	298
1.人民的心灵之光	298
2.清新的风	341
3.“自己的小提灯”	362
4.变化	377
“第四幕”	400
1.“啊,军乐奏得多好啊!”	400
2.“您正视生活”	436
附录	487

“秘密成长的心灵”

1860年1月。

“我们跨入了新的十年，既不抱过高的希望，也不带太大的失望……”^①——在伦敦出版的《钟声》报^②这样标志新的历史路标说。

在波利采伊斯基^③大街，在格努托夫^④的住宅里，塔干罗格市三等商人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契诃夫家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安东尼。

大街的名称和房主的姓氏好象是故意虚构的，好象是从谢德林或者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中取来的（顺便提一下，市里唯一的一家报纸也叫做《波利采伊斯基小报》）。

这是农奴制在俄国生存的最后一年。

① 《钟声》，1860年1月1日，引自复制本，《钟声》，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2，第三期，第491页。

② 《钟声》（1857—1867），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在国外办的报纸，对俄国革命起过推动作用。——译者

③ “波利采伊斯基”是俄语“警察”一词的音译。——译者

④ “格努托夫”与俄语“弯腰、折腰”一词的读音相近。——译者

但是,在这一年之后,人民却仍将长久地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

伊斯坎杰尔-赫尔岑在《钟声》上写道:“臭名昭彰的教化者们,你们哪怕只让一代人受一受人的教育吧,让他们能够正视一切,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公开地鼓掌,公开地集会……”^①

四十年之后,在1901年3月,“安东尼”在逝世前不久写信给妻子说:

“我收到一些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寄来的颇有凶兆的信件,我怀着厌恶的心情阅读现在的报纸。”^②

信里谈到的是大学生学潮,学潮的起因又是(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臭名昭彰的教化者们”不让人“受一受人的教育”,不让他们“正视一切……,公开地集会……”等等。

要从波利采伊斯基大街搬到别处去是困难的!

要让格努托夫挺直腰板也是不容易的,就如同谢德林所幻想的使格鲁波夫^③城变成乌姆诺夫^④城一样难。而如果格努托夫完全是用古怪的方式“教育”出来的话,那就会特别难!

在契诃夫诞生的那一年,《钟声》告诉了读者们一件悲惨的事情:

“在1849年,诺夫戈罗德省原阿拉克切耶夫领地的农民们在铁路附近割草。在干活的农民中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瓦西里·谢尔

① 《钟声》,1860年1月1日,复制本,第三期,第494页。

② 安·巴·契诃夫,《作品、书信全集》二十卷本,第19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0年,第64页。以后引证这一版本时,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罗马数字表示卷次,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而引用新的、尚未出齐的三十卷《作品、书信全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的引文时,注明《作品集》或《书信集》,并在其后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次和页码。

③④ “格鲁波夫”与俄语“愚蠢的”一词的读音相近,而“乌姆诺夫”则很象“聪明的”一词的读音。——译者

科夫……他是霍季洛夫村的。他走着走着，来到了铁路旁，他看见一列火车从他面前飞驰而过。‘试试看，’他想，‘如果在铁轨上堆上一堆石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大车会不会翻掉呢？’由于无知，这孩子想了一想之后就马上动起手来。他搬来了一些石头，并把它们放在铁轨上。护路兵正巧看到了他……”^①

此后，这个“犯人”在监狱里和苦役中度过了十一个年头！

再过三十八年之后，契诃夫将写出他的短篇小说《凶犯》。在这个作品中，一个穿着打补丁裤子的瘦小的乡下人，杰尼斯·格里戈里耶夫也将要遭到看来是与男孩谢尔科夫同样的命运。

但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发生在塔干罗格市的事情。在安东要进中学读书的时候，契诃夫一家又一次“乔迁”，他们迁到了莫纳斯蒂尔斯克大街和雅尔玛罗奇纳胡同^②的拐角上。

生活好似又一次展示了它纯朴的象征^③：契诃夫一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安东和他的兄弟、妹妹的童年时代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修道院式的和集市式的。

安东、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三兄弟在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组织的教堂唱诗班里唱了差不多十年的诗。

“有时，”契诃夫在后来回忆说，“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唱三重唱，唱《悔改吧！》或《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声》，人们都非常感动地看着我们，他们都很羡慕我的父母，而我们三人这时却感到自己是小苦

① 《钟声》，1860年9月15日，复制本，第三期，第679页。好像是命运在嘲弄一样，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拉吉谢夫作品中的旅行者从彼得堡到莫斯科去所经过的地方，他幻想着（正巧是在《霍季洛夫》那一章中）消灭农奴制。

② 俄语中“修道院”一词的读音是“莫纳斯蒂尔”，而“雅尔玛罗奇纳”则是“市场的”一词的音译。——译者

③ 维克托尔·罗马年科在《没有童年的童年》一文（见他写的《承认天才》一书，基辅，1977年，第91页）中写道：“单单在契诃夫一家曾经居住过的那些街道的名称里，就有着某种真正象征性的东西……。”

役犯人。”(《书信集》, 5, 20)

在父亲开设的小杂货铺里度过的漫长时日, 也是很少有什么乐趣的。

“在父亲的小杂货铺里,” 哥哥亚历山大在回忆安东时写道, “他马马虎虎地复习自己的功课; 在这里他经受冬日的严寒, 冻得手足发麻; 在这小杂货铺里, 他象一个囚徒在监牢里一样, 苦闷地度过学校放假的美好时光。”^①

不仅契诃夫弟兄在回忆“宝贵的童年”时“笔调”是惊人的“一致”, 而且他们的同乡和同时代人的回忆“笔调”也是“一致”的。

例如, 作家 B. Γ. 塔恩 (鲍戈拉兹) 写道: “塔干罗格中学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犯人劳动大队。那是一个感化营, 不同的只是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堂译作替代了棍棒和皮鞭。”^②

小苦役犯, 囚徒, 犯人劳动队……

有一张昔日塔干罗格男子中学的照片保存下来了: 寂静无人的走廊, 门都向着走廊, 门上都开了小圆窗, 使学监可以透过小圆窗监视学生的举动。这活象透过牢门的“窥视孔”对犯人进行监视。

真使人觉得, 好象在走廊里马上就会闪现出“套中人”别利科夫的灰色影子来。

别以为这一切只是特殊的“地方色彩”。

塔干罗格中学绝非什么例外。当时整个国民教育制度很自然地是反动政府政策的阴暗“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由于当时在教育领域确立了令人悲叹的著名的“古典制度”(这种制度实质上就是要学生死记硬背各种古代语言的语法规则)。一些历史学

① 《同时代人回忆安·巴·契诃夫》, 莫斯科, 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0, 第32页。

② B. Γ. 塔恩是契诃夫在塔干罗格中学时的同学。引文见《纪念契诃夫文集》, 莫斯科, 1910, 第497页。——译者

家认为，正是在教育领域里“最彻底地贯彻了政府政策的反动精神”。①

照柯罗连科的说法，如果说Д. А. 托尔斯泰在做教育部长时所“操心的是不让中学生的精神生活蓬蓬勃勃地开展，而只让它温顺而萎靡地在官方大纲规定的轨道之中活动”②的话，那么在民意党人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不久，当上了内务部长的Д. А. 托尔斯泰当然要竭力把他的意图贯彻到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去。

1879年契诃夫在中学毕业，五年后他在莫斯科大学毕业。这正好是反动的乌烟瘴气达到了“顶峰”的时期。

这时契诃夫家已经破产。由于害怕债主逼债，未来的作家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早在1876年就悄悄地到莫斯科去了，后来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也迁到了莫斯科。

契诃夫在塔干罗格过了几年非常艰苦的生活，只是在中学毕业以后他才又来到了父母身边。而他的迁居莫斯科好象又一次迁到了“波利采伊斯基大街”：虽然他的家庭根本不问政治，但是在民意党人索洛维约夫谋刺沙皇(1879年4月)之后突然出现的恐怖镇压，甚至也牵连了契诃夫家的一些莫斯科新交。例如，契诃夫的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在绘画、雕塑和建筑学校学习期间的朋友、未来的著名画家И. И. 列维坦就一度被行政当局强令迁出莫斯科。

1883—1884年是残酷压制出版活动的年代。查封由萨尔蒂

① Д. А. 扎伊昂奇科夫斯基：《十九世纪末的俄国专制制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反动)》，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0，第309页。

② В. Г. 柯罗连科：《文集》，十卷本，第5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第286页。

科夫-谢德林主编的主要民主主义刊物《祖国纪事》杂志,使这种压制活动达到了极点。

契诃夫本人很少详谈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人和作家的历史及情况的。

他在1899年写道:“我生着一种病,它叫做自传恐怖症。阅读那些关于我的详细描述,尤其是要我为报刊撰写关于我自己的东西,——这一切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XVIII, 242)

因此,我们也就更易理解一些研究者的做法:他们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契诃夫在这方面的任何“失言”。难怪在所有论述契诃夫的著作中都引用了他在给A. C. 苏沃林的信中所说的一番话:

“您该写一篇小说,描写一个青年,他原是农奴的儿子,做过店员和唱诗班的歌手,进过中学和大学,从小受到必须要尊敬长者、要亲吻神甫的手、要崇拜别人的思想、要为每一小块面包道谢的教育;他经常挨打;出去教家馆时他没有雨鞋穿;他常常打架,虐待动物;他喜欢在富有的亲戚家里吃饭;他只因为觉得自己渺小就毫无必要地在上帝和人们面前假充正经。请您写这个青年怎样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醒来时,他觉得在他的血管里流着的已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了……”(《书信集》, 3, 133)

这里所提供的题材在许多方面与契诃夫本人的现实经历“交织”在一起,所以它非常自然地促使人们把两者混为一谈。例如,И. 古尔维奇说,在这里“契诃夫回顾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自己的思想发展,他向苏沃林‘暗示’比作品题材更多的东西。”Л. 马留金则断言:“契诃夫建议苏沃林写一篇关于他契诃夫的短篇小说。”①K.

① И. 古尔维奇,《契诃夫的小说(人和现实)》,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0,第52页(着重点是我加的——安·屠尔科夫); Л. 马留金,《契诃夫,中篇传记小说》,《顿河》杂志,1969,第二期,第75页。

丘科夫斯基也持同样的见解。^①

但是，契诃夫即使在与苏沃林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也未必会对苏沃林真诚到这般冒失的程度，未必会这般直言不讳地和极其天真地把他自己的纯属个人的体验作为文学素材提供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作另一种性质的设想。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上面引证的那些话是契诃夫在谈到剧本《伊万诺夫》的那封信中写的，关于这个剧本契诃夫说道：

“我怀着一个大胆的梦想：把别人在以前写过的有关灰心和愁闷的人们的一切作品做一个总结……”（《书信集》，3，132）

我觉得，在上述顺便草拟的题材中也有着类似的“总结”，它不仅概括了他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也概括了别人的类似的典型情景。显然，按契诃夫的思路来看，就连收信人苏沃林本身的经历也是包括在内的。

须知那时和契诃夫通信的苏沃林是一个与契诃夫的出身非常近似的人，他们的经历在有些方面也是相象的。确切一些说，就写信人的意思来看，在苏沃林的经历中也有着与信中提及的题材相交的“交叉点”。否则，要苏沃林来写这样一个短篇小说的建议就会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是浮夸的。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种题材的梗概，或者说是一个人的生平梗概。

我认为，作下面那种臆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契诃夫知道别人是纯粹从他的经历这个角度来解释他给苏沃林的信的话，他准会为此生气，就象当有人把《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人物简单地

① 在引了契诃夫说的“您该写一篇小说，描写一个青年……”这一段话后，他就在括弧中解释道：“即契诃夫本人”。（见：K.丘科夫斯基，《文集》，六卷本，第2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5，第647页）

与现实中存在的人相等同时他曾生气过一样。

撰写契诃夫传记的人在解释契诃夫如何选择职业这一点时，常常援引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母亲表露过的稚真愿望：“……你一定要考医学系，要尊重我的意见，这是一种最好的职业……”^①

在这里我们几乎是第一次遇到了作家生活中的“潜流”。这种潜流无疑是存在的，因为正是它使契诃夫成了契诃夫。但是，由于契诃夫性格中的某些特点，也可能是由于他的谦虚，由于他遵循独特的“节约精力”原则，避免无谓的争辩、“解释”等等原因，我们远非经常能够觉察到这种潜流。

“……我不记得，当初我出于何种考虑才选了医学系，但后来我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患“自传恐怖症”的契诃夫自己在一生的后期这样写道。（XVIII, 243）

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话剧《三姊妹》中的一段对白：

“玛莎：您爱过我的母亲吗？”

“切布蒂金：很爱。”

“玛莎：她也爱您吗？”

“切布蒂金：（稍停）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了。”

显然，老医生切布蒂金守贞似地保守着他的秘密，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就象不能把老医生的话信以为真那样，我们也难于相信契诃夫的“健忘”，难于相信他竟会忘记那个促使他作出一生中重要决定的动机。

Л. 马留金在他撰写的一部很有意义的契诃夫传记（可惜这部传记由于作者逝世而未写完）中，把契诃夫在莫斯科作出的职业

^① Н.И.基托维奇：《安·巴·契诃夫的生平和创作年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第36页。

选择解释为年青人对自己的文学才干信心不足，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对他的“试笔”和艺术观点作过轻蔑的评论，而这种评论对他产生了影响。

Л.马留金的结论是：“契诃夫该怎么办呢？他只好听从父母的意见，选择实惠的医学系了。”^①

后来契诃夫喜欢开玩笑说，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但能不能因此就说他的这一“婚姻”是一次“讲究实惠的婚姻”呢？而他对“妻子”的长期忠贞只是品格端庄的表现，只是贯彻“习于相近，就会相爱”原则的结果呢？

或者，恰恰相反，他选择医学专业是否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虽然形式是谦逊的）举动，就象他后来作出前去库页岛的决定一样呢？

大家知道，契诃夫是不喜欢“理想”这个词的，他认为在这个词里有一种“苹果糕似的东西”。但不管他以后怎样称自己为“旁观主义者”，他确实是有理想的。

很有意思的是，在几年之后，在1889年，契诃夫在读完了他大学时代的教授扎哈林写的一部著作后说，在这本书里“已经没有在我做大学生时听到过的那种调子了。”（《书信集》，3，295）

契诃夫认为，所以会这样的原因是在于“天才的教育家和演讲家并非总是还算不错的著作家”。但是，我们觉得，当时不只是在教授的演讲中，而且也是在聆听他讲授的大学生的心坎上鸣响着这里所谈及的“调子”。

在著名旅行家H. M. 普尔热瓦利斯基逝世时，契诃夫写道：“对于象普尔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人，我是无限热爱的。”（《书信集》，3，44）

^① 《顿河》杂志，1969，第1期，第35页。

因此，可以很自然地设想，契诃夫所描写的这一类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和反映了他自己的理想的。

他在纪念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悼文中写道：“他们坚持思想原则，他们高尚的荣誉心以国家和科学的荣誉做基础；他们具有顽强的精神，他们的目标一旦确定，任何困苦、危险、个人幸福的诱惑都不能征服他们对既定目标的追求；他们知识渊博，热爱工作……，他们热烈地信仰基督教文明和科学——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体现高度道德力量的英勇献身者。”

难道根据契诃夫后来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评价全部用来说明契诃夫本人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蜻蜓》、《闹钟》、《观众》、《光明与阴影》、《读者指南》、《世俗谈》等幽默杂志上开始出现一个崭新的名字：安东沙·契洪特。

后来契诃夫本人认为，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879年12月24日。这一天他向《蜻蜓》杂志投寄了短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不久后（1880年3月9日），这个作品就在《蜻蜓》上发表了。

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契诃夫发表处女作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①

1882年，初显身手的文学家接到一家当年最畅销的幽默杂志《花絮》的编辑、著名作家H. A. 列伊金的邀请，请他与该杂志合作。不久，他就成了《花絮》的积极撰稿人之一。

安东沙·契洪特有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1883年，他十分肯

① 参阅 M. П. 格罗莫夫的文章《安东·契诃夫：初次发表的作品，第一本书》（《普洛米修斯》文集，第二卷，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7年）。

定地对H. A. 列伊金说：“如果我把我在一个美好的冬夜写出的一切都寄给《花絮》，那么我的这些材料足够您用上一个月。”（《书信集》，1, 74）当缺钱用的时候，他会开玩笑似地向熟人说：“您要不要买我的短篇小说？对您我可以每一百卢布让一个卢布。我的小说比海水浴场里的小鱼还多。”（《书信集》，2, 119）

甚至在很久以后，当契诃夫已经抛弃他青年时代的笔名并开始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以前见到过的或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很多人物和事件仍在继续“围攻”他。

在契诃夫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在我的头脑里有一大群人在请求我把他们写出来，他们正在等待着我的号令。”（《书信集》，3, 47）。而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又写道：“轻松喜剧的题材在我的头脑里太多了，它们一个劲儿要往外钻，就象巴库地下的石油一样。”（《书信集》，3, 100）

许多年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准备出版第一套文集。他发牢骚，说他得翻阅“堆积如山”的、当年安东沙·契洪特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小品和幽默作品。他说：“当我把这许多东西收集起来的时候，我只能耸耸肩、摊开双手——惊讶不已。”（XVIII, 169）

契诃夫诙谐地把自己的早期作品称作“皇村中学式的”（当时正好在庆祝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他说，在翻阅这些作品的时候，他“怀着厌恶的心情重温”自己的“生活”（摘自著名诗作的诗句！）。

1899年1月5日，契诃夫在写给朋友B. A. 季霍诺夫的信中说：“我在回忆我们在同一个‘分舰队’里服役的情景……”

在他所回忆的那个时期里，文学“分舰队”正受着极其激烈的围攻。

在沙皇尼古拉统治的时代，杜别利特甚至对驯顺的《北方蜜蜂》这种刊物也画定了一个许可“范围”，他对布尔加林说：“戏院、

展览会、市场、旧货摊、小饭馆、糖果点心店——这就是你的活动范围，不许你超越这雷池一步”。^①

这些未成文的规章(不过，也有许多是法律已经固定下来的规章)，在以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终结和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为标志的大倒退时期，仍然在发生作用，文学刊物越来越多地感到了这种作用。

当代人回忆说，当年的报刊有一个最多疑的热心读者，这就是波别多诺斯采夫^②。在民意党人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以后，这个波别多诺斯采夫极力鼓吹反动派应采取进攻。于是，谴责报刊“放肆不端”的指令一个接着一个地下达。

例如，报刊事务总管理局在1885年4月发布通令说：“在接受书报检查的刊物中，特别是在一些讽刺和幽默杂志中，常常出现一些关于各种人物的短评，对这些人物的社会活动进行并非平静和认真的讨论(进行这种讨论，“特别是”在讽刺和幽默杂志上，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安·屠尔科夫)，而是指名道姓，使用一些不成体统的、尖刻的、甚至是辱骂性的语句。”^③

就是这些杂志的名称好象也无意中反映了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气氛。

《闹钟》好象是在对赫尔岑主编的《钟声》的光荣名称进行嘲弄。《钟声》起过警钟的作用，但它早已消声匿迹了。

《蜻蜓》和《蟋蟀》这两种杂志名称暗示着愉快、轻浮和温厚，好

① Л.В.杜别利特(1792—1862)，俄国的宪兵头子，在1839—1856年间任“第三厅”厅长，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反动代表之一。Ф.В.布尔加林(1789—1859)，反动报纸《北方蜜蜂》编辑。——译者

② 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反动政客，专制制度的疯狂维护者。——译者

③ П.А.扎伊昂奇科夫斯基：《十九世纪末的俄国专制制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反动)》，第270页。

象保持着那种做作的微笑。当代人认为，这种微笑只是“那个佯作快乐的时代所发出的戏谑腔调。”^①

《花絮》这名称则好象是在急于预先声明，它所谈的只是一些细微、琐碎、偶然的事情。

难怪人们会把《花絮》的主编、当年的著名幽默作家列伊金本人称作“小谢德林”。

这些刊物以及它们的编辑和作者好象都是预先就把腰弯下，好让猖獗怒号的书报检查风暴在自己的头上一飞而过。当时这风暴是针对于谢德林主编的已处在风烛残年的《祖国纪事》的。

在《祖国纪事》被封闭以后，H. A. 列伊金写信给契诃夫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要约束一下自己，要收敛一些，否则恐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②

瓦西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后来回忆说：“在任何险恶的沿海地方，都没有象我国多灾多难的报刊在其存在的时代里遇到过的那种暗礁、水下岩石和激浪。而这还不过是当年的报纸所处的寻常境地。它除了那许多在日常‘航行’中遇到的困难以外，常常会遇上谁都意料不到的突如其来的旋风。谁都可以狠狠地敲打报纸！每一个人所共知的坏蛋在一旦偶然占据了多么重要一些的官职之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才能使自己更牢靠地与社会舆论隔绝，与社会舆论的表达者——报刊隔绝。为了这个目的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秘密指示，非法取缔，暗中进行凶……如此众多的杀人陷阱，圈套，夜袭和各种强迫手段，就连中世纪意大利的凶杀者也都不会想到的，但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人们对这一切却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在新闻界都不见有什么抗议。”^③

① A. B. 阿勃菲捷阿特罗夫，《文集》，第14卷，彼得堡，教育出版社，第135页。

② 转引自M. 古辛，《契诃夫的创作》，国立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1954，第4页。

③ 瓦西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墓地上》，雷维尔，1921，第113页。